

語言的休眠、復蘇與新陳代謝

李亞明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看過美國電影「WINDTALKERS」(《風語者》，又譯《風語戰士》)的朋友一定還記得，美軍印第安士兵用印第安土著語作為電報密碼發送情報，日軍雖然截獲，卻無法破譯；美軍由此建立奇功。日軍無法破譯這些密碼的主要原因，是美洲印第安語(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中的許多土著語已經滅絕或瀕臨滅絕。

20世紀90年代，美國阿拉斯加大學語言學教授克勞斯(Michael Krauss)在《陷入危機的語言》一文中預言，全球約6000種語言將在一個世紀內滅絕一半。他還說：「要是地球上的人類語言消失了90%，語言學就是歷史上唯一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研究領域消失的學問。」¹ 這個預言震動了整個語言學界。克勞斯由此創立了「阿拉斯加本土語言中心」，想盡可能地保存阿拉斯加原住民還會說的20種語言。這些語言中，孩子還有機會學的只有兩種，有幾種只有幾位年長的人還記得，其他的很快就不怎麼流通了。麻省理工學院的赫爾(Kenneth L. Hale)也在同一期《語言》(Language)雜誌說道，他所做過田野研究的語言中，有8種已經消失了；1990年在澳洲所做的調查表明，90種仍然存在的原住民語言中，有70種在各年齡層都已經不經常使用了。² 耶魯大學的惠倫(Douglas H. Whalen)也由此創建了「瀕臨滅絕語言基金會」。

語言真的會滅絕嗎？史達林認為：「語言比任何基礎、任何上層建築都生存得長久得多。這正說明，不僅是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基礎及其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致會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一種語言的結構，產生具有新的辭彙和新的語法構造的新的語言。」³ 但他同時也認為：「語言的辭彙對於變化是最敏感的，它處於幾乎不斷變化的狀態中。」⁴

1 《語言》雜誌(Language)，1992年。

2 同注1。

3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4 同注3。

但事實上，語言的發展和變化遠不是那麼簡單，絕非簡單地用To be or not to be就能概括得了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⁵ 陰陽對轉，其道無窮。語言的發展，既有休眠的階段，也有復蘇的時刻；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內在的因素。語言的新陳代謝是一種複雜的現象。

從文字來看，我們至今仍能從埃及宗教祈禱和祭祀文獻中找到古埃及及聖書體文字，從伊斯蘭教文獻中找到古阿拉伯文，從醫藥學、動物學、植物學、化學、天文學和天主教文獻中找到古拉丁文，從東正教祭祀文獻中找到教會斯拉夫文。

從語音來看，格里姆定律揭示了日爾曼語輔音轉移的音變現象實際上就是局部的語音系統的迴圈變化。徐通鏞發現：「(山西)祁縣方言出現新的韻尾 -m 和 -b，使漢語中已經消失了的音韻結構重新復活，說明語音系統中確實出現了某種迴圈的變化。」⁶ 比較音韻學還可以根據古文獻裏的語言材料和現代方言的實際讀音，推測古代語音，總結語音的內部發展規律。

認語更能說明問題。例如，拉丁美洲至今仍殘留著西班牙的某些古詞語，如「毯子」，在西班牙現在稱為 Manta，拉丁美洲則仍稱為 Frazada。而辭彙擴散理論關於詞語中斷的變化的研究，被語言學界公認為精華。「許多已經衰亡的詞會東山再起，現在享有殊榮的詞會一落千丈。」⁷ 就連歷史學界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

從漢語來看，「古代豐富無比的書文作品，成為漢語不斷豐富其現代辭彙的一個十分獨特的泉源。因此，古詞語的類集並不凝固而無發展，它是處於一種常會擴大變動範圍的活動狀態的。」⁸ 孫常敘師《古漢語文學語言辭彙》歸納出古漢語文學語言詞語的四種性質——今而用古的超時代性、推陳出新的能產性、古今詞的相對性、結構造詞的復原性。詞源學證明，改變和綜合舊詞，把舊詞從舊的序列轉到新的序列中，為了新的需要，改變其意義，並在一切新義中找出距舊義之一有某種相似之處，這樣，新詞就創造出來了。

例如，王力曾以「貸款」的「貸」字為例說明：「有些新的概念需要比較特殊的字眼去表示它。這所謂特殊的字眼，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只是從古代辭彙的倉庫裏取出來賦以新的生命。」⁹ 「文革」期間，「乃爾」、「克己復禮」、「彈冠相慶」等詞不絕於耳，仿古詞語 (Archaism) 一夜之間變成了新創詞語 (Neologism)。「公社」一詞，古指祭祀天地神鬼

5 《莊子·天道》。

6 徐通鏞：《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18。

7 貢布里希：《在時尚、風格、趣味的研究中歷史決定論的替代理論》(倫敦：1965年) (*The Logic of Vanity Fair: Alternatives to Historicism in the Study of Fashions, Style and Taste*)。

8 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彙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49。

9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新1版)，頁575。

的處所，或指原始社會中的成員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結合形式；1958年後的二十年間，「公社」忽然風行一時，表示政經合一的鄉級組織。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公社」一詞沈寂了二十年。時至21世紀初，「公社」一詞又忽然冒了出來，意思卻變成了「以企業為主、農民土地使用權入股的股份合作制企業」¹⁰。又如，漢語中的「同志」本指「志趣相同的人」，漢代鄭玄注《周禮·地官·大司徒》「五曰聯朋友」一句：「同志曰友。」郭在貽師發現杜荀鶴的詩喜歡用「同志」一詞，「其含意與今之『同志』略近。」¹¹後來成為人們彼此之間的通稱；但現在又變成了同性戀的代稱。這中間是怎樣轉變的呢？我推測，可能是「同志」的「同性」義當了橋樑。¹²如今，人們在商品品牌戰略中，也借用舊詞表示新義。Apple (蘋果) 被用來表示一種電腦的品牌，shell (殼) 被用來表示一種石化油品的商標，但消費者恰恰借此建立起了特定的概念。

英語中也有許多這種創造和轉移辭彙的方法的痕迹。通過合併兩個或更多的舊詞以構成新詞的方法，是增補辭彙的主要手段之一。

由上可見，語言的發展是一種從休眠中復蘇式的新陳代謝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互不相干的割裂式的消亡與新生。「就其現實的本質來看，語言是某種持續地每時每刻消逝著的東西。即使是文字對語言的紀錄也始終只是一種不完全的木乃伊式的保存，但這種保存卻一再需要人們在那裏尋求活生生的轉化。」¹³「變化的原則以連續性的原則為依據。」¹⁴

在中外文化史上，不乏人為地喚醒休眠語言的例子(正反兩個方面的例子都有)。東漢時，「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義，漸復古代的面貌。於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這樣改一次已經夠折騰了，王莽卻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後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記不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後注舊名。可以想象，這樣頻繁的改名必定會給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

10 《武漢：「公社」舊詞有新義》，《中國改革報》，2000年11月1日。全文如下：「沈寂了近20年的『公社』一詞，近日被武漢和平科技集團推出——『和平農業公社』10月28日在武漢市江夏區大橋村宣告成立。據對江夏區良種場大橋村的420戶、近2000位農民的調查結果，他們都表示願意加入和平農業公社。該農業公社是以企業為主、農民土地使用權入股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它由農民、科研人員、企業和單位自願入股的股份組成，將分散承租的土地統一規劃使用，提高土地的效率，使分散的封閉式經營結構走向企業化、產業化、市場化。『公社』一詞在這裏被賦予全新含義。」

11 郭在貽：《讀書腔錄》，載《郭在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四卷，頁14。

12 (明)楊慎《台容詢淫》：「與冰同志。」當然，這裏的「性」是「性質」的「性」，不是「性別」的「性」，但隨著「性」產生「性別」的意思，「同性」也跟著產生了新義。拙文《古代漢語詞義範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8年)曾對範疇在古代漢語詞義演變過程中的橋樑作用做過闡述。

13 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

14 索緒爾著，屠友祥譯：《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4。

帶來極大的麻煩，不但影響效率，造成浪費，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¹⁵ 唐代「古文運動」中，「韓退之自信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¹⁶ 明代弘治、正德年間和嘉靖、隆慶年間，相繼出現了以李夢陽、何景明和李攀龍、王世貞等為代表的「前後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目的在於挽救「正統文學」的危機，但由於盲目復古，一味類比，結果使文學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危機。正如清代朱庭珍所評論的那樣：「明七子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戒讀唐以後書，力爭上流，論未嘗不高也；然拘常而不達變，取徑轉狹，猶登山者一望昆侖，觀水者一朝南海，即侈然自足，而不知五岳、四瀆、九江、五湖、三十六洞天奇之，天下尚別有無數妙境界也。則拘於方隅，必不能高涉昆侖之顛，遠航大海之外，徒自崖而返，望洋興嘆已耳。」¹⁷

20世紀初，章太炎在《噓書》中認為，宋代以後的漢字數量越來越少，常用的字數不過數千，以至大部分漢字變成廢棄不用的古字。要使譯者能夠順利翻譯和輸入外國的作品和知識，一方面要創制新字詞，另一方面則要起用已廢棄的古字或某字的古義；同時，除非在古字中找不到可翻譯外來新詞語的字詞，否則不應濫制新語。但是，《噓書》一味追求文言文的原始面目，以至佶屈聱牙，限制了本身的傳播效果，連魯迅也讀不懂：「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版的《噓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¹⁸ 魯迅還說：「我的文章裏，……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¹⁹ 但魯迅用文言文翻譯的《域外小說集》，書店只賣出了40多本；另一本用文言文翻譯的外國小說，乾脆被出版社退稿。魯迅後來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授課時，仍然沒有改變用文言文譯寫生理衛生課講義的習慣。據夏丏尊回憶：「原來他（指魯迅）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還故意用著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系』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字學素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²⁰ 所以，「仿古是不值得提倡的；雖然有人這樣做了，但這是開倒車。語言將順著它的內部規律發展，而不會受仿古主義者的影響。」²¹ 魯迅正是因為早期曾經親身感受過人為地喚醒休眠語言的失敗，

15 葛劍雄：〈我看王莽〉，《讀書》，1997年第10期。

16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七。

17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

18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六，頁545。

19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七，頁4。

20 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二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08。

21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新1版），頁579。

所以才毅然決然地投身於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旗手。

另一方面，休眠語言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正如王力的辯證觀點那樣：「我們對於文言文，應該給於新的估價。特別是對於文言文中的富有生動、精練的優點的成語和典故，應該繼承下來。」²² 1941年5月「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使用了一些貼切生動而富有生命力的古詞語，例如——「為之一新」、「粗枝大葉」、「一知半解」、「發號施令」、「生吞活剝」、「謬種流傳」、「實事求是」、「嘩眾取寵」、「欽差大臣」、「華而不實」、「無的放矢」、「徒有虛名」等等。我們在新聞語言中，也可以利用古舊語言形式（包括詞語、句法形式等）並將其改造成新的語言形式，或擴展、引伸、變更古舊語言形式，從而達到「出新」的效果。例如新聞標題——「珠峰失足，險矣！墜入我境，幸哉！」（1995年12月4日《光明日報》）；「王菲日本狂掃帽子，進貢十萬日圓」（2001年10月30日《深圳熱綫》）；「江城昨日普降甘霖」（2002年1月9日《武漢晚報》）；「春節晚會出場費多乎哉不多也：大腕小腕一律1000元」（2002年1月10日《楚天都市報》）；「廣州『毒大米』等三案判決，5無良米販被判罰」（2002年1月11日《華西都市報》）。等等。

在國外，歐洲文藝復興的「復興」一詞（拉丁語 *Renascor*，英語 *Renaissance*）兼有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中英雄的生命力量奇迹般地復活以及基督教中耶穌基督心靈再生的意思，這兩個意思同樣可以用來喻指語言。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丁語作家認為中古拉丁語脫離了古典拉丁語，不夠純潔和規範，從而以古典拉丁語為榜樣進行創作，推行「新拉丁語」。培根、牛頓、彌爾頓和莎士比亞都曾用拉丁文寫作，並從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學中汲取語言營養。

在國內語言學界，王希杰提出了「潛性語言」和「顯性語言」的理論。他把歷史上出現過但現在已經消失了的語言成分和那些即將出現的語言成分稱為「潛性語言」，而把客觀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語言稱為「顯性語言」。「語言的發展演變的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一、顯性語言的潛性化——一些顯性的語言成分消失了，退出了大舞臺，到後臺去了；二、潛性語言的顯性化——一些潛性的語言成分從後臺來到了前臺，出現在我們的言語生活中來了。」「語言的潛在倉庫為語言的發展演變提供的保證。社會文化語用所需要的東西首先得是這個倉庫裏所具有的；社會文化語用所不再需要的東西，退出前臺之後也可以在這個倉庫裏存放著——如果有了必要，它還可以再次登臺表演的，許多二、三十年代的詞語，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退出了前臺，潛性化了，堆放到這個倉庫裏去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社會文化語用條件具備了，對它們又有了需求，於是它們再次顯性化了，重新發臺表演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舊詞語的復活』。」²³ 于根元也認為：「語言的

22 同注21。

各種調節，都可以歸結為語言的潛和顯，而它的總趨向是滿足社會不同方面的和諧與矛盾共處共生的交際、思想、認知的需要。」²⁴

語言的休眠、復蘇和新陳代謝不只是語言本身的事情。正如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洪堡特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能把語言看作一種僵死的生產品，而應視之為一種生產過程，不能只注意語言作為物件之描述和理解之仲介的語言的作用，而更應當謹慎地回到語言的與內在精神活動緊密交織的本源和語言與這一本源的相互影響上去。」²⁵

語言的休眠、復蘇和新陳代謝也不一定是直綫式的，有時還經過好幾次反覆和輪回。正如于根元所說的那樣：「有序無序是相對而言的，是時刻發生的。潛和顯也是相對而言的，也是時刻發生的。」²⁶「(靜態和動態)兩者關係密切，往往相互轉化，從不同的方面共同為人們的交際服務。穩定的部分都是從新的來的。穩定的部分當初都是新的。新的是穩定的唯一來源。構成新的基本成分是原有的穩定的。」²⁷

研究語言的休眠、復蘇和新陳代謝現象，對於描畫語言演變的歷史軌迹、總結語言發展的規律、預測語言未來的趨勢、制定國家語言文字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23 王希杰：《略論語言預測學》。

24 于根元：《語言應用研究的隊伍建設》，《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一期。此外，班雅明 (Benjamin) 也曾提出：「在有生命或無生命的自然界中，沒有任何事或物不以某種方式共用著語言，因為任何事物在其本質上都是對其自身的精神內容的傳達。」萬物的精神存在「在 (In) 語言中，而不是通過 (Through) 語言來表達自身」。人的語言與物的語言的分別正在於：人的語言是一種「名稱語言」(Name-language)，而物的語言則是一種「未加言說的無名語言」(The Unspoken Nameless Language)。正是基於這一區別，人獲得了他(她)在世的職責，即為無名的萬物命名。人類通過這一過程，把事物不完善 (Imperfect)、啞啞 (Dumb) 的語言轉換成更完善的語言——亦即聲音的名稱。(《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Benjamin, Walter. 1996.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25 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

26 于根元：《語言應用研究的隊伍建設》，《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一期。

27 于根元：《語言哲學對話》(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頁113-114。